

開放的紀念性：中山陵建築精神溯源

◎ 李恭忠

前言

一座建築，往往通過有形的形態、構造和裝飾，來表達建造者的主觀意念，甚至特定時代的風尚和思潮，從而體現出某種或隱或顯的建築精神。中山陵是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紀念性建築群，其建築精神的設定和表達，包含著對孫中山的思想、事跡及其歷史地位的理解和詮釋，集中體現了國民黨人借助墓葬這一途徑，來營造「孫中山」這一新的時代符號、增進民族和國家認同的用意。學術界以往對中山陵的研究，多從建築本身著眼，關注布局、形制、建築美學等方面的內容；¹ 而對於建築形式背後的時代背景和政治內涵，卻少有深入的研究，² 以至於到現在為止，這方面的主流觀點依然不脫國民黨人當年的宣傳話語，即認為中山陵的寓意在於「警鐘長鳴」、「喚起民眾」。本文依據相關檔案、文獻和實地考察心得，³ 從建築與政治的關係入手，努力挖掘中山陵設計意圖、建築形式背後的政治內涵，並結合行為、儀式方面的研究，試圖從另一個側面，對中山陵的建築精神作出新的探討。

一、選址南京的政治內涵

中山陵選址南京，而不是廣東或別的地方，這一選擇包含了豐富的信息，與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政治進程緊密相連。

這個選擇是孫中山本人做出的，並且由來已久。1912年3月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後，與胡漢民前往紫金山打獵，途中有感於自然形勝，曾提及死後願意安葬於此。⁴ 當然，這還只是一時的戲言。不管怎樣，孫中山確實在1912年流露過歸葬鐘山這個念頭。1925年3月11日，也就是臨終前一天，孫中山明確對汪精衛提出，「吾死之後，可葬於南京紫金山麓，因南京為臨時政府成立之地，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。」⁵ 這次談話，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最後選擇。

孫中山最終葬於紫金山，與明孝陵這一含義豐富的文化遺存頗有淵源。孫中山與朱元璋這兩個人物，客觀上有一定相似之處，即推翻少數民族統治，光復漢族政權。而且，包括孫中山和國民黨人在內，當時的人主觀上也有將孫、朱比而論之的意思。清帝剛剛退位，孫中山就親率各部將校和數萬軍士，赴明孝陵舉行盛大典禮，聲稱清廷的覆亡，「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，有以牘啟後人，成茲鴻業」，「非我太祖在天之靈，何以及此？」因而要來恭謁陵墓，「告無罪於我高皇帝」，當面稱頌其「驅除光復」之偉勳。⁶ 但孫中山畢竟身處與朱元璋不同的時代，因而有著與後者不同的理念和追求。正如吳稚暉在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遷

寧成立典禮上指出的，朱元璋只知民族主義，孫中山則在民族主義之外，兼圖發展民權、民生兩主義。⁷ 因此，後來中山陵選址時，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（以下簡稱葬事籌備處⁸）各位成員，包括孫科、宋慶齡，都強調墓址地點應高於明孝陵，並且「不可使人在更高處建墓」。⁹ 結果，建成後的中山陵，墓室高度超過南京歷代所有陵墓，比明孝陵還高90多米。¹⁰ 確定中山陵碑石的大小時，也度量過明孝陵神功聖德碑，¹¹ 因而建成以後的碑石也高於前者。這一切都表明，南京中山陵的建造，與明孝陵所凝聚的歷史文化內涵之間，確實有著一定的關聯，表達了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繼承和超越傳統民族主義思想、建構新式國家形態的抱負。

另一方面，孫中山這一選擇，也表明他非常看重「南京」這一空間符號在中國現代歷史中的象徵意義，並且試圖通過葬身南京，為身後的國民黨和全體國民留下一個關於現代中國的記憶焦點。對於孫中山而言，辛亥革命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，既是畢生事業的巔峰，也是一生最大的遺憾。而南京則是所有這一切的見證。辛亥革命以後，孫中山始終以護衛民國為己任，努力督率同人，將中國造就為名副其實的現代國家。可惜直到他逝世為止，這一理想仍未實現。南京這座城市，他也沒有再踏進一步，而永遠留在了記憶之中。因此，南京是孫中山生命記憶的凝結、人生意義的象徵和未竟期望的寄托；選擇葬身南京，等於給後來者留下一個強烈的信號，與他那句著名的政治遺囑一道，時時提醒他們繼續努力，以完成自己生前未竟之功。

對此，孫中山的後繼者顯然心神領會。國民黨人把孫中山的墓址選擇，當作新式中央權威的象徵，並積極將「南京」這座城市建成為新的政治中心。1927年初，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往武漢。隨著國民革命迅速挺進到長江下游地區，從1927年4月初起，國民黨人即反覆鼓吹「南京是總理指定的首都」、總理曾指定南京為「永久國都」。¹² 國民黨上海兵工廠政治部的通電指出：「辛亥革命，總理曾定為首都矣。總理逝世，復遺囑指為基地矣。建都於此，既可佔形勢之便，亦足增警惕之思，誠莫善於此者。」¹³ 1927年4月18日，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遷寧典禮，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發表演說，重申建都南京是孫中山的主張，「生前早有表示，觀其生前不遂死後欲葬於寧即可見一斑。」¹⁴ 一年以後，北伐軍佔領京津地區，社會上紛紛傳言國民政府將遷都北京，國民黨控制的輿論於是又反覆宣傳「南京乃總理指定之首都，無可變更」；蔣介石也在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上說，國都問題沒有必要討論。1928年6月20日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正式議決，將北京改名為北平，¹⁵ 社會上的傳言遂逐漸平息。

可見，在墓地選址南京這一點上，孫中山自己和國民黨人都賦予了豐富的政治內涵，即紀念與象徵，由此奠定了中山陵建築精神的基調。

二、建築精神的構想

中山陵的建築精神，無論是初始設計，還是實際建築效果，主要呈現為「開放的紀念性」。這一精神的設定，並非出於國民黨人單方面的努力，而是在其主導下，多個方面共同作用、相互疊加的結果。

1、國民黨人

1925年3月20日，陳去病、唐昌治、戴季陶等人致函《廣州民國日報》，歷數鐘山及明孝陵之

沿革，認為「總理委靈如此……足以慰在天之靈，而來萬姓之答禮」。他們提出了墓地布置的四條指導思想：「一、偏於平民思想之形式者；二、有偉大之表現者；三、能永久保存者；四、能使遊覽人了然先生之偉績者。」並且提出了具體的墓地規劃：「墓前築石階為廣大之靈台」，「其中央立碑，以四方形，篆刻總理之遺囑教訓，及一生之事績。頂端安置先生全身銅像。最前闢為廣場，中置噴水池，左立音樂亭，右為紀念堂。廣場之南，建屋五楹，環植松柏石楠之屬，並鑿池迭石，養鶴栽花，以為遊人休憩之所。」¹⁶ 這些設想體現了中西合璧的傾向，既要突出鮮明的紀念性，全面彰顯孫中山的「國父」、「革命之父」的形象；又要兼具遊覽功能，便於遊人參觀、休憩，富有現代公園氣息，以表達出時代新氣象。

1925年5月，葬事籌備處在《申報》、《民國日報》、《廣州民國日報》等處刊登啟事和徵求條例，面向國內外公開懸獎徵求孫中山陵墓圖案。關於陵墓功能和建築風格，徵求條例中的要求與陳去病等人的建議大體一致，可以歸納如下：一是體現「特殊與紀念之性質」，也即具有鮮明的紀念性。二是便於參觀和舉行紀念活動，墓地應建於交通便利的地方，應設計登臨石階和墓道大路以利交通，祭堂前必須有「可立五萬人之空地」以舉行祭禮，墓門必須能夠靈活開關以便謁陵者入內瞻仰。三是揉合中國傳統建築風格與現代建築技術。祭堂圖案「須採用中國古式（Chinese Classic）」，「或根據中國建築精神特創新格亦可」，但「一切建築均用堅固石料與鋼筋三合土，不可用磚木之類」，以便保存永久；墓室建築「在中國古式雖無前例，惟苟採用西式，不可與祭堂建築太相懸殊」。四是簡樸莊嚴，墓式不要過於奢侈華貴。¹⁷

這樣，國民黨人已經清楚地提出了自己對於中山陵建築精神的構想，那就是「開放的紀念性」，以使墓地建築能夠表達出「孫中山」這一符號的獨特內涵。這一立意，既承續中國古代紀念建築的傳統，其中對於「平民精神」的強調，又與傳統陵墓形成了鮮明對照。中國古代的帝王陵墓，一般鎖閉於高牆密林之中，嚴格限制民眾接近，只對皇家開放，因而其紀念功能是內閉的、獨佔性的。但孫中山的墓地，卻要設計成一個開放的紀念空間。顯然，國民黨人非常清楚，中山陵的紀念性不應專屬於哪個家族、宗派或社區，而應是開放的、屬於全體國民的。也就是說，孫中山的陵墓建築，不僅將要凝聚關於孫中山本人的歷史，也將負載整個國家的記憶和認同，從而作為一個巨型的時代符號，在某種程度上，成為新的「中國」的象徵。

2、設計者和評判專家

國民黨人要求中山陵必須採用「中國古式」，或者根據中國建築精神「特創新格」。但究竟甚麼才是「中國古式」、「中國精神」，陵墓圖案徵求條例中並未作出明確界定。一方面，這是由於葬事籌備處諸人並非建築專家，無法就此問題作出明確界定；另一方面，國民黨人也認識到，孫中山的陵墓「不特為民族史上之偉大永久紀念，即在中國之文化與美術上亦有其不朽之價值」，因而有必要「合海內外美術專家之心思才力以計劃此空前之建築」。¹⁸ 也就是說，國民黨人無力、也無意壟斷所有的闡釋權力，而是為別的社會力量（比如作為專家的建築師、工程師、美術家）留下了一定的闡釋空間，並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合作。

各位應徵者出於不同理解，提交了各具特色的圖案。外國建築師提交的「Liberty」和「天下大同」圖案純粹為中國式樣。特別是「天下大同」圖案，基本上仿照中國傳統陵墓的布局、形態，甚至用料、色彩上也頗為相似，以致凌鴻勳批評它「太像古代陵寢」。¹⁹ 中國建築師

呂彥直、范文照、趙深提供的圖案，則體現了中西結合風格。

在這個問題上，各位評判專家的觀點基本一致，都強調「融合中西」這一核心要點，並以此作為評定各項圖案的重要依據。王—亭認為，純粹的中國古式，與孫中山融合中西的精神不合。樸士認為，「故大總統孫公常融合中西文化為心，鄙意此種精誠之表現，似應為陵墓建築之特殊性質。」²⁰ 凌鴻勛則從孫中山的歷史地位著眼，更深刻地闡釋了中山陵的意義及其應有的風格。他指出，徵求條例中規定的"Chinese Classic"一語，因中國向無建築專史，"Classic"一字，本來無所專指。中國歷史悠久，古代建築非常發達，所謂"Classic Architecture"，斷非天壇、皇宮之類建築所能包括。他認為，「孫先生之陵墓，係吾中華民族文化之表現，世界觀瞻所繫，將來垂之永久，為遠代文化史上一大建築」，因此，「應採取國粹之美術，施以最新建築之原理，鞏固宏壯，兼而有之」，才能「表現孫先生篤實純粹深厚之國性」，「發揚吾民族之精神」，在東方建築史上留下一個紀念。²¹

凌鴻勛提倡國粹之美術，並且強調它不僅限於天壇、皇宮之類建築，是有針對性的。1860年代以來，中國的建築學界主要是外國人的天下，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築為特徵，以致有研究者稱這一時期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「洋風」時期。²²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，以美國建築師墨菲為代表，西方建築師開始把中國傳統官式建築形式運用於新的公共建築，並標榜為「中國建築的文藝復興」。²³ 但他們眼中的中國傳統風格，主要限於明清時期，明代以前的建築傳統，還未引起重視。因而，對於中國建築傳統的探討和總結，還有待於中國人的進一步努力。凌鴻勛之深意蓋在於此。

根據評判專家的意見，呂彥直的圖案被評為第一名。他的設計「前面作廊廡……堂頂復檐，上層用飛昂博鳳之制……」祭堂內頂為穹窿式，用砌磁「作青天白日之飾」，地面鋪紅色煉磚，「以符滿地紅之徵象。」祭堂四壁貼大理石板，「上刻中山先生遺囑及建國大綱等文」。墓室外部只露穹窿式圓頂，內頂亦飾以青天白日之砌磁。建築用料主要為石料與鋼筋混凝土，門窗屋瓦用銅，「此外如通風防濕等制，亦皆依科學的方法而設施之。」這一設計被稱贊為「合於中國觀念」、「全體結構簡樸渾厚」，「形勢及氣魄極似中山先生之氣概及精神」，「最適合於陵墓之性質及地勢之情形」，²⁴ 因而順利獲得首獎，並被葬事籌備處選用。

建築界，尤其是中國建築工程專家這些相對自主的意見，對國民黨人的意見形成了補充。特別是「融合中西」的風格、關於青天白日的裝飾，以及石刻文字紀念這幾點建議，都非常切合孫中山陵墓的特色。由此，在國民黨人的主導、建築界專業人士的參與下，黨派的政治追求和行業的專業意見得以溝通，並達成了「協作」。中山陵「開放的紀念性」這一精神，由此得到了更完整、更準確的設定。一方面，中山陵必須凸顯一種紀念性，即安葬和祭吊逝者、彰顯逝者的歷史地位、播揚逝者的不朽精神。另一方面，這種紀念性又是開放的。一是與中國傳統陵墓相比，中山陵更具平民氣質，其紀念功能面向更加廣泛的紀念者；二是中山陵的建築風格體現了中西結合的特徵，傳達了中華文明的時代出新這一主題。概括起來，就是領袖氣魄、平民氣質、中國氣派、現代氣息的統一。

三、空間、裝飾與建築效果

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，從圖紙上看「略呈一大鐘形」。²⁵ 評判顧問凌鴻勛指出，這一圖案

「有木鐸警世之想」。當時，國民黨人正努力將「總理精神」貫注於陵墓建築，因而極力推崇這一點，稱讚它「寓意深遠」，²⁶「頗足表現總理偉大精誠之人格」。²⁷後來研究者也附從此說，稱這種空間布局「象徵著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於喚醒民眾，反抗壓迫，為拯救國家、民族奮鬥不息的偉大精神」。²⁸多年以後，這一點現已為學術界、中山陵園管理部門、傳媒和普通大眾廣泛接受。

但實際建成的中山陵，對於謁陵者來說，空間布局上最強烈的感觸，並非「木鐸警世」這一寓意，而是陵墓的開放特徵。

空間布局上的開放特徵，源於陵墓的初始修築意圖。國民黨人在徵求陵墓圖案時明確要求，祭堂應建在地勢較高之處；並特別強調，祭堂前面應有一塊可容五萬人的空地，以保證陵墓空間疏朗開闊，使相關的紀念活動更加便利。呂彥直設計圖案時參照了這一要求，陵墓起點與終點之間保持大約七十米的相對高度，依山勢構成一個開闊的斜面。陵墓各項建築，即從南到北、由低到高次第排列在這一斜面內，隨地勢拉開了相對高度，並且貫串在一條中軸線上。

建成後的陵墓結構簡潔，分工明確的寥寥數筆，就勾畫出了中山陵的基本輪廓。牌坊作指示，墓道為引導；圍牆及與其相連的陵門圈定陵院空間；體現紀念功能的陵墓主建築——碑亭、祭堂與墓室，則分別佔據陵院高低兩端，而以石級石階連接起來。由此，整個中山陵顯得開闊、明朗而宏壯，仿佛一個安坐的巨人，正敞開胸懷歡迎謁陵者的到來。特別是在陵墓剛建成不久時，墓道、石級石階兩旁種植的樹木還未成林，這種開闊感更加顯著（見圖1）。



圖 1 建成之初的中山陵

這種結構和布局，與中國傳統陵墓形成了鮮明對比。中山陵往西翻過兩個小山頭，就是朱元璋的孝陵。明孝陵的整體布局呈「北斗七星」狀，進入陵區正門後，神道從神功聖德碑（今名四方城）開始西折，經過兩座擎天柱後折向北，至櫺星門復折向東北，兜了大半個圈子之後，再經過御河橋，往北直行，才見陵院正門。一步一步進去，才能次第看見碑亭、御廚、宰牲亭、稷恩門、焚帛爐、左右廡、具服殿、享殿。又入內紅門、過升仙橋，才見方城、明樓和寶城。²⁹明十三陵、清東西陵，陵院內的空間布局都與明孝陵類似。³⁰這種空間布局，與帝制時代的宮殿建築有共通之處，即以門、牆、橋、屋宇等建築反覆組合，把平面空間步步分割，使最核心的建築（墓室）居於幽秘之處，從而顯示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深邃、神秘氣氛。這與中山陵的空間布局剛好相反。

無獨有偶，與中山陵基本同時建造的廖仲愷墓，以及30年代初建造的譚延闓墓，在空間布局上也體現了開放性特徵。這兩座墓也在紫金山南麓，分別位於中山陵東西兩翼。廖仲愷墓建

在一座低緩的小丘南坡，主體結構也像中山陵那樣，從南向北、由低到高依次排開，並且貫串在一條中軸線上，謁陵者進入陵門，抬頭便可看見正北邊的半圓形墓穴。譚延闓墓因為地勢的緣故，各部分未能集中在一條中軸線上，但卻巧妙地利用了地形，使整座墓園成了一個曲徑通幽的公園，更加具有親和力。可見，國民黨人並不想繼續傳統陵墓那種幽秘、封閉的風格，而希望它體現「平民精神」，更容易讓普通人接近。

空間布局上的開放性，還表現在墓室構造上。明清時期的陵墓，墓室結構非常講究規制，一般模仿皇宮的布局，³¹ 喪者入葬後便封死，上面夯土植樹，形成圓丘狀小山，內部具體結構不復為人所見。中山陵的墓室，不僅外頂裸露於地面之上，而且室內也是開放的。室中央為圓形石塘，圍以白色大理石欄杆，石塘中央即為墓穴所在方位。孫中山正式入葬之後，墓穴用鋼筋混凝土封死，不為謁陵者所見；其上方塑一座石棺，棺面塑白色大理石的孫中山臥像，以為謁陵者瞻拜。這種結構，既莊重、典雅，體現了安葬死者的本義，又不失親切，容易喚起謁陵者的親和感，仿佛真實的孫中山就在眼前，勞累之後正在熟睡。

另一方面，陵墓的材質和裝飾，呈現了不同於古代陵墓的藝術風格，表達了對中國傳統的推陳出新，以獨特的方式強調了陵墓的紀念性——即對孫中山及其主義的追念和尊崇。

按照國民黨人「為永久計」的要求，中山陵墓室、祭堂、平台、台階、碑亭、陵門、牌坊，主要使用石頭和鋼筋混凝土。所有門窗均用銅製。這樣，整座陵墓簡樸牢固，渾厚天然，足資垂以久遠。各部分建築的裝飾圖案和色彩也顯得簡單樸素。祭堂、碑亭、陵門、牌坊的雕飾線條簡潔，並且都未著色，處處流露樸實莊重之感，頂部不用傳統的黃色琉璃瓦，而用藍色琉璃瓦覆蓋。祭堂和墓室內頂的兩處天花板，當為整座陵墓中裝飾最考究之處，都用青、白、紅三色小快砌磁拼成國民黨黨徽形狀，白日居中，青天環繞，外為紅色底面，象徵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之意。這種裝飾方式，雖然不像中國傳統陵墓那樣雕梁畫棟，光彩華麗，卻新穎別致，自成風格，在簡樸的手筆中透露出巍然氣度。

中山陵的文字襯飾更見特色。中國傳統陵墓建築的裝飾，多以圖案、色彩和雕刻見長，除了有的神功聖德碑上的長篇碑文以外，一般較少襯飾性文字。中山陵則不然。牌坊、陵門和祭堂中門上方，分刻孫中山手書「博愛」、「天下為公」、「天地正氣」十個鎊金大字，樸實端正，在陽光下躍然入目。祭堂門楣分刻張靜江篆書「民族」、「民權」、「民生」六字。祭堂內壁，分刻《建國大綱》全文、宋慶齡跋文、蔣介石和胡漢民書《總理校訓》和《總理遺囑》，以及譚延闓書《總理告誡黨員演說詞》。此外，墓室兩道門楣，分刻孫中山手書「浩氣長存」和張靜江篆書「孫中山先生之墓」等字。³²

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對文字、對先人遺訓的虔敬傳統。俗語「見字如見人」，即個人手墨可以作為書寫者身份的代表；死者的遺墨則容易勾起後人的追懷和遐思。在敬宗法古的時代，先人遺言遺訓更是得到尊重。執掌政權的皇族，先代皇帝在國體政綱方面的遺訓，仿佛具有如同憲法般的權威。千百年來，這種傳統已經積澱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，雖入二十世紀仍未完全消失。中山陵這些襯飾文字，充分利用了這種文化心理，從形式和內容上突出了陵墓的紀念功能。尤其是孫中山的手書和著述，無不明確提示著墓主的身份地位和期望，昭示著後來者的責任和義務之所在。用國民黨人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「遵從總理遺囑，貫徹總理主張，……對內喚起中華民族的意識，挽救中華民族的墮落與危亡，盡力去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，……對外發揚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，……使中華民國得到自由平等，卓然獨立於世界」。³³

陵墓所有文字當中，碑文別具深意。關於碑銘傳記，葬事籌備處曾於1925年底推舉吳稚暉、汪精衛、胡漢民、張靜江四人分頭撰寫，並推舉譚延闓、于右任、張靜江書寫（三人分別擅楷書、草書和隸書，在民國時期享譽一時）。但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非常激烈，葬事籌備處的大部分成員，包括張靜江、吳稚暉、林森、孫科、宋子文在內，都陷身於現實政治旋渦之中，既沒有心思，也沒有能力為孫中山作出「蓋棺定論」。於是，葬事籌備處最終決定，墓志銘、傳、記文字全都不用，碑文正文只用「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」十三個字，理由是「以總理之偉大，非墓志銘、傳記文字所能包括一切，故以不用為宜。」³⁴

雖然只有短短十三個字，但卻點出了整座陵墓獨特的紀念涵義，尤其凸顯了「黨葬」的性質。按說民國以來，國葬已成為最高規格的葬禮。但國民黨人顯然認為，國葬的名義並不能顯示孫中山的應有地位。原因在於，只要是中央政府，就有資格授予某人國葬榮典。段祺瑞掌握的北京臨時執政府，就曾經為孫中山頒發國葬令。³⁵ 這種國葬對於別的人可能是榮譽，但對致力於「再造民國」的孫中山和國民黨來說³⁶，只是對手展示權威的文化工具。另一方面，國葬可以給予多人，例如伍廷芳、廖仲愷、譚延闓、林森，死後都獲國葬榮典。因此，國民黨人不用國葬的名義，而用黨葬的名義來埋葬孫中山。³⁷ 此前和此後，都沒有其他人享用這一名義。這樣，孫中山的獨特地位，以及國民黨與墓主的特殊關係，便得到了特別的強調。碑文中沒有對墓主長篇大論的歌頌，反而給謁陵者留下了一定的自由闡釋空間，起到了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的效果。

四、行為、儀式與建築精神的實現

對於紀念性建築而言，建築精神一方面需要通過其物質形態本身來表現，但更重要的是通過人的行為，才能最終得到實現。中山陵得以體現出開放的紀念性，圍繞陵墓展開的近乎儀式化的行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這種近乎儀式化的行為，從孫中山安葬之日即已開始。1929年6月1日，孫中山正式安葬，國民黨當局組織數萬人前往墓地參加典禮，陵墓石級平台，一時萬人攢動，全體人員脫帽、肅立、致敬。在一片哀樂聲中，蔣介石、孔祥熙在前指揮靈柩緩步登上石級、平台，孫中山家屬、戚屬在後步行隨護，各國專使、孫中山故舊在右，國民黨中央委員、國民政府委員、國民政府各特任官、迎梓專員、孫中山葬事籌備委員在左，分別在孫科、戴恩賽帶領下，在兩旁執紼扶靈前進。靈梓進入祭堂後，蔣介石率國民政府五院院長，代表國民政府致祭，然後由孔祥熙率杠夫移靈進入墓門安葬。其時哀樂大作，鳴禮炮101響，祭堂內外數萬人向陵墓三鞠躬，肅立默哀三分鐘。³⁸ 極其隆重莊嚴，既使人激情飛揚、又讓人戰戰兢兢的奉安大典，至此順利告成。

建成後的中山陵，成了一個開放的儀式空間。陵園管理當局於1929年9月頒布了《謁陵規則》，規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對遊人開放，三月至十月每天開放九個小時，十一月至二月每天七個小時；每逢國慶日（1月1日、5月5日、10月10日）、孫中山逝世紀念日（3月12日）、孫中山奉安紀念日（6月1日）和孫中山誕辰日（11月12日），還開放墓門，讓謁陵者進入墓室瞻仰。³⁹ 由此，中山陵成了南京的一處新景觀，前往參謁、遊覽的人眾絡繹不絕。據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警衛處的不完全統計，從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，謁陵人數即有33.5萬多人，最多的月份達67,000人，最少的月份也有2000人。⁴⁰

國民黨當局則依靠組織途徑，圍繞中山陵持續展開了一系列近乎儀式化的行為。每年的重要節日如元旦和國慶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、國民政府委員、各特任官一般都要前往陵墓，舉行集體參謁活動。特別是孫中山誕辰日和忌辰日，國民黨中央都要組織大規模的謁陵活動，在南京的黨、政、軍、警各級機關、各學校、各團體，都要派代表參加。國民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期間，與會人員通常都要前往謁陵。此外，遇上一些臨時性的重大事件，國民黨當局也要組織謁陵活動。比如1931年6月1日，本是孫中山奉安紀念日，適逢《中華民國訓政時期臨時約法》公佈，國民黨中央於是在中山陵祭堂舉行擴大紀念周，中央各要人與京內各機關公務人員，齊集陵墓參加盛典，在孫中山靈前「誠懇接受訓政時期約法」。⁴¹

從微觀行為的角度來看，在謁陵活動中，謁陵者走過牌坊、置身於陵墓空間後，耳目所及，思緒與情感逐漸調動起來。及至走完石級、台階，登上平台，抬眼便見祭堂大門上方「天地正氣」四個大字，以及門楣上的「民族」、「民權」、「民生」六個字，登臨心情亦漸達高潮。步入祭堂，便看見孫中山的雕像巍然居中而坐，雙目平視遠方；頭頂上方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圖案，古樸而莊嚴；堂內牆壁的石刻文字，簡潔而有力。這種莊嚴肅穆的氛圍，傳達著一種無聲而有形的力量，使謁陵者的心智，一時間仿佛超越了時空，完全沉浸在「孫中山」這個符號所連接起來的意義網絡裏。尤其在群體謁陵行為中，盛大的場面和莊嚴的儀式更加強化了這種氛圍，使謁陵者感到，個體的自我已經融入一種莊嚴深邃的整體氛圍中。

這樣，建成後的中山陵，沒有成為一個獨佔性的「孫記」或「（國民）黨記」空間，而成了一個公共的、但又有著鮮明的「黨化」色彩的儀式空間。孫中山的「親密同志」和「忠實信徒」在其中居於主導地位，掌握著其中的儀式權威和意義之源；孫中山的一般信徒和普通民眾在其中居於從屬地位，但也有一些自由發揮的餘地。通過這種反覆的近乎儀式化的謁陵行為，國民的一致記憶和認同便逐漸凝聚起來，陵墓的建築精神於是得到了真正實現。

結 論

總的來看，在國民黨人的主導和建築業人士的參與下，中山陵的整體結構和細部裝飾，營造了古樸淡雅、宏壯疏闊、貼近自然的氛圍，突出了一個納天地之正氣、取中外之精華、承繼往而開未來的形象。國民黨人努力表現出孫中山人生境界的偉大和高遠，不僅是為了讓孫中山永垂不朽，也表達了自己對這種偉大、高遠境界的推崇、期求和自許，以及對謁陵、瞻仰者的期待和要求。簡言之，以至大、至德、至善的「孫中山」這一新的時代符號，作為新生國家權威的象徵；並通過儀式化的謁陵行為，將這一符號及與之相連的意義傳輸給國民，以凝聚和增強新時代的民族國家認同。這便是中山陵「開放的紀念性」的內涵之所在。

註釋

- 1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，可參見姚遷、古兵：《中山陵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），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建築、園林、城市規劃卷》（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1988）「中山陵」詞條，劉先覺等主編：《中國近代建築總覽·南京篇》（北京：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，1992）。
- 2 汪利平敘述了孫中山逝世後北京的悼念活動、中山陵的設計、國民黨定都南京後圍繞「孫中山」名義進行的建設、以及1929年的孫中山奉安大典，在話語分析和意義闡釋方面不乏洞見，但對中山陵建築形態與政治文化的關係挖掘不夠，對當時的宏觀政治進程和中山陵建築精神的深刻內涵失於把握，以至於文中呈現簡單化的傾向，把「孫中山」這一符號的建構，更多地比

- 附於蔣介石個人政治權威的塑造。見Liping Wang, "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: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", *Republican China*, 21-1 (April 1996): 23-63.
- 3 中山陵、明孝陵、譚延闓墓、廖仲愷墓，全都位於南京東郊的紫金山南坡，至今保存完好，利於進行實地考察和比較研究。本文關於中山陵實際建築效果的論述，主要得自於實地考察。
 - 4 《申報》，1912年3月12日。
 - 5 上海《民國日報》，1925年3月16日。
 - 6 《孫中山全集》第2卷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），頁94-97。
 - 7 上海《民國日報》，1927年4月21日。
 - 8 該組織1925年4月18日成立於上海，全面負責中山陵建設和孫中山身後喪葬事宜，1929年孫中山正式安葬後，改組為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，繼續負責中山陵園的後續建設和管理。其具體架構、成員、職能，及其與國民黨中央關係的變遷，頗有可值得注意之處，容待另文論述。
 - 9 南京市檔案館、中山陵園管理處編：《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55。
 - 10 《江蘇文史資料選輯》第5輯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81），頁249。
 - 11 《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》，頁98。
 - 12 上海《民國日報》，1927年4月4日、4月6日、4月8日、4月13日、4月16日、4月19日、4月22日。
 - 13 上海《民國日報》，1927年4月19日。
 - 14 上海《民國日報》，1927年4月21日。
 - 15 《中央周報》第4期，1928年7月2日，頁4。
 - 16 《廣州民國日報》，1925年3月31日。
 - 17 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編：《孫中山先生陵墓圖案》（上海：民智書局，1925），頁5-8。
 - 18 《孫中山先生陵墓圖案》，「緣起」。
 - 19 上海《民國日報》，1925年9月26日。
 - 20 《孫中山先生陵墓圖案》，頁20、22。
 - 21 上海《民國日報》，1925年9月26日。
 - 22 張復合：〈中國近代建築史「洋風」時期之典型〉，載吳煥加、呂舟編：《建築史研究論文集》（北京：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，1996）。
 - 23 潘谷西等主編：《中國建築史》（北京：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301-302。
 - 24 《孫中山先生陵墓圖案》，頁11-13、19-22。
 - 25 《孫中山先生陵墓圖案》，頁11。
 - 26 總理奉安專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總理奉安實錄》（南京：1930），頁41。
 - 27 《中央周報》第53期，1929年6月10日，頁30。
 - 28 劉先覺等主編：《中國近代建築總覽·南京篇》，頁7。
 - 29 葉楚傖等：《首都志》（南京：正中書局，1935），頁274-78。
 - 30 參見晏子有：《清東西陵》（北京：中國青年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25-46。
 - 31 註30晏子有，頁162-175。
 - 32 《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》，「工程」部分頁4-7。
 - 33 《中央周報》，第4期，頁13-14。

- 34 《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》，頁75、117。
- 35 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編：《哀思錄》（上海：1926），第一冊，卷七、治喪報告，乙、治喪經過，頁2。
- 36 參見李恭忠：《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——孫中山奉安大典研究》（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，2002年6月）。
- 37 孫中山奉安期間，景泰藍公司請求於奉安日在紫金山前發售紀念章，葬事籌備處討論決定，不准使用「國葬紀念」字樣。見《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》，頁136。這件小事和碑文文字相互襯映，顯示了國民黨對黨葬和國葬的不同看法。
- 38 《總理奉安實錄》，頁56-57。
- 39 《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》，「法規」部分頁32。
- 40 《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》，「統計」部分。
- 41 《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》，「警衛」部分頁2-4。

李恭忠 1974年生，1996、1999、2002年分別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、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歷史學系，分獲歷史學學士、碩士和博士學位，現任教於南京大學歷史學系，主要從事中國近、現代史研究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十三期 2003年4月30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十三期（2003年4月30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